

更新换代中的朝鲜族文学

□崔三龙(朝鲜族)

观察近10年来的朝鲜族文学，我发现，每年都会有100篇左右的短篇小说、20篇左右的中篇小说和5部左右长篇小说面世。通过阅读部分作品，我切实感觉到，朝鲜族文学已经更新换代了。

信手翻一翻文学期刊和报纸的文艺专栏，就会感觉到，除了长篇小说的作者，中短篇小说作者的名字大都不断翻新，阅读这些文本，也感到在主题和价值取向上了诸多变化。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一人的判断。

在朝鲜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金学铁等富有斗士精神的作家曾写出了极具独立思考的作品，以林元春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曾推出《亲戚之间》《伞在雨中泣》等优秀之作。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进行创作的崔红一、禹光勋、李惠善、许连顺等知青出身的作家，曾引领朝鲜族小说的发展。而现在，弘扬新美学的青年作家开始涉足文坛，朝鲜族文学也迎来了新时代。

可以看出，崔国哲、金革、具豪俊、韩永南、赵光明、赵龙基、朴玉南、金英子、朴草兰、金锦姬、李振华等作家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开始成为朝鲜族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中除了崔国哲等一两人以外，大部分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更是让人们感受到朝鲜族小说更新换代的迅猛态势。在我看来，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创作手法和叙事策略上，都比男性小说家更为先锋，也涌现出不少佳作。

笔者在这里提到的“更新换代”绝不是以小说家的年龄来划分的，而是在对朝鲜族小说的主题变化与人物形象特质进行分析，对小说的创作手法与叙事策略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所作的结论。

观察近年来的朝鲜族小说，我发现那些“时代传声筒”式的颂歌几乎销声匿迹，也鲜有对社会阴暗面的简单描摹。相反，作家们将更多的笔墨聚焦于对人性的描写。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迅猛增长的背景下，人民所经历的生活变迁与精神烦恼，值得作家持续关注。很多人的生活日益世俗化，在一种混沌的生活原生态中，作家们试图探索在复杂万分、变化多端的现实中所展现的生命本体与人性本源。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长篇小说的变化相对慢一些，因为它大多聚焦于对传统、历史与社会的真实描写，体量也比较大，要实现翻新需要花费更大的工夫。中短篇小说在反映现实的灵活性上、在形式的多变性上，都更加得天独厚。因此，我们谈及朝鲜族小说的新变，在中短篇小说领域表现得较为明显。

我觉得现在朝鲜族小说的思想主题与意识取向更趋多样化。其中，既有反映民族生活与精神传统的，也有对人生虚无与生命荒诞进行思索的；既有对日益物欲化的生活现实进行聚焦的，也有对破碎的乌托邦与逝去英雄的呼唤；既有对“他人即是地狱”的决绝式表达，也有对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向往。当然，也不乏对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作家勇敢地面对

本民族的民族劣根性，把一些丑陋的东西全面地揭露出来。因此，朝鲜族小说塑造的人物中，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中间人物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哪怕是再优秀的人，或者是作者憧憬和肯定的人物，也有着一定的缺陷和问题，而不管是怎样的反面人物，也有着一些正面的人格魅力。

在许多小说中，很多人物都是灰色调的。具体说来，他们大多是每天为生活奔波的草根，不是那些可以惊天动地鬼神英雄人物，也不是那些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做出一些让众生厌恶之事的十恶不赦之徒。他们大多离家谋生，却又感到迷茫，不知路在何方。也有一些人，他们得以在某一地方落了脚，却时刻为欲望所困，忙于找寻失去的“自我”。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带给读者的文学氛围就是灰色调的，作品的主题是模糊的，大多具有悲剧色彩。

除了思想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变化，朝鲜族小说在创作手法和叙事策略上也都有所创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作家的崭新追求。

他们的作品彻底打破了生死对立、殊死斗争的两极对立的模式，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等阵线分明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已经销声匿迹。每部小说都在讲述某一生命个体的内心纠葛，比如自我的丧失、精神的

困惑以及主体的堕落等等。有时候，甚至连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不大鲜明，仅限于对瞬间记忆碎片的描写。

作品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更加多样。描写和叙述在小说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逐步消失，真诚的情感吐露带来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作品整体或者片段，很多作者灵活地运用象征手法。因此，小说的语言也日益呈现出诗化的趋势。

在创作手法上，朝鲜族小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作方法不只是语言文学体的问题，也不只是形式技巧的问题，而且涉及把握时代、理解生活的基本审美观。在各民族文学中，写实主义长期占据小说创作的中心地位，它能够如实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存在的状况。在朝鲜族文学中，情况也是如此。但一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也纷纷涌现。观察近年来新锐小说家的作品，我发现他们在创作手法上不断创新，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可喜的事情。

在他们的作品中，作家们通过对现实生活阴暗面的批判、对生活中种种不公的揭露，将生命个体的世俗体验用小说生动地表达出来。因此，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在创作手法上，朝鲜族文坛虽然涌现出不少基于传统经典美学的坚持写实主义方法的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不同于传统写实主义的新写实主义小

说。这些小说进行语言文学体的实验与叙事策略的更新，强调现代生活的差异性、碎片化、精神分裂现象，表现出肢解固定化价值观与知识体系的思想倾向。

因此，习惯阅读写实主义作品的朝鲜族读者也开始接触原来陌生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那些原来固守写实主义的小说家们也开始运用意识流、元叙述、戏谑、反讽，甚至还运用了碎片化与拼贴、迷宫与含混、变型与梦幻、悖论与错位等现代小说手法。

对于朝鲜族小说的这些变化，很多人的见解莫衷一是，我自己对之也并不是很满意。尤其是在我们的小说中，历史意识的缺乏与真善美的缺失，令人甚是担心。历史绝不只是流逝的时间，实在是历史的延续，这是起码的常识，但近年来，小说家却普遍忘却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中，诞生了许多新现象，而在市场经济下，也不只有阴暗面，更有着真善美，但近期我们的小说中，却很少有这些方面的内容。

小说创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当然也与新锐小说家们的思想观念有关。令人欣喜的是，近来已经有作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中开始有了历史意识，开始积极地弘扬真善美。

我上面所论述的主要是小说这一领域的创作情况。在诗歌、散文、戏剧等领域，朝鲜族这些年也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但是，在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在别的文体创作实践中同样存在。我期待有更多朝鲜族青年作家在继承好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写出更多有分量的作品。相信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朝鲜族文学创作会取得新的成就。（新煜/译）

·创作谈·

文学需扎根于现实

□李范洙(朝鲜族)

在题材、技巧等方面都应该具有开放性，使其更加具有创作上的可操作性。

可是，纵观后来近20年的朝鲜族文学的范本取向，似乎还是没能走出以韩国文学为主的藩篱。中韩建交伊始，朝鲜族作家们对韩国文学的趋之若鹜、顶礼膜拜，固然有它语言表达的亲近感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新鲜感所促使的客观原因。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中国本土文学话语的熟视无睹，导致一些朝鲜族作家对国内文学发展状况并不熟悉。另一方面，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又无法让朝鲜族作家在韩国文坛上谋得一席之地。所以，在经历了多年的“哈韩”以后，朝鲜族作家还是在自身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沟壑中彷徨着。再加上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朝鲜族文学自然面临着

文学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一边是作家作品遍地开花的“繁华景象”，一边却是文学期刊编辑们到处组稿，却总是苦于找不到好作品而闷闷不乐的境地。

现代化的无限膨胀，使得向来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朝鲜族社会，开始以城市化的名义“分崩离析”。这体现在：赴韩国的劳务输出和移居中国内地城市或国外所导致的农村荒芜现象；出现大量的空巢家庭和留守儿童；男女比例失调，农村小伙难以娶亲；生源逐年减少导致的民族教育后续问题；生存成本的大幅提高而产生的精神焦虑、道德崩溃……这些何尝不是生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朝鲜族群体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呢？

面对这样的现实，新一代的朝鲜族青

年作家要有所作为。特别是“70后”和“80后”的朝鲜族作家，应该属于具有责任感和挑战性的一个群体，不应该沉浸在孤芳自赏的文字游戏中无法自拔，而应该沉下心来，仔细观察现实，写出有力度的作品。

令人欣喜的是，很多的作家不管出于自身的敏感嗅觉也好，还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也罢，写出了一些颇具现实意义的作品，如小说家许连顺、朴玉男等。还有一些作家近期热衷于传记文学的写作，为民族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东奔西走、笔耕不辍，如李慧善、崔国哲、金革等。诗歌方面，如长期置身于中国生存现场的金赫日，以不乏锐气的现代视角，以充满质感的诗化语言，喷发着个人及群体积蓄已久的情感能量。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

对我来说，民族现实主义是目前朝鲜族作家，尤其是诗人，必须重新咀嚼的话题。小说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诗歌回到内容和技巧的返璞归真，这才是已经漂浮在现实土壤之上的许久的朝鲜族文学，可以重新落地并开花结果的不二之选。

的源泉。叙述这样那样的故事，也就是编故事。不能说有情节就能成为小说，也不能说有了人物就是小说，但我认为，小说必须有情节。有了情节，才能彰显小说的故事性，有了故事性，小说才会有趣味。因此，我在动笔前，往往会构思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只有在故事情节中灵动的人物形象才能成为生活化的人。我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各的不同，比如《螳螂》中身患自闭症的古吉男、《看见声音了吗？》中看口型就知道其憨的哑巴小贤的妈妈、《断》中不愿与人打交道的离婚女民英、《肥皂泡泡》中因怀孕而被摘除子宫的“我”，都各具特点。我讲述向社会妥协的人们的故事，也写那些远离喧嚣世俗生活的人们，让读者理解人生、了解社会、感受人情冷暖。我坚信，生活中有故事，即便我不写，小说也在那里。

时至今日，我与我所叙事的平凡琐碎故事中的主人公仍然在同一呼吸，讲述世间百态。尽管我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只要有人倾听，相信就一定会有他们心中掀起波澜。（新煜/译）

短篇小说《面壁》即将收尾，新罗的高僧圆光法师在陈国求法、布教的过程中，被隋朝军人抓获，被捆到塔前，即将命悬一线之际……《虎丘志》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形的：

当时，隋朝的一位将军碰巧路过，发现寺庙和塔正在熊熊燃烧。他快马加鞭赶过去一看，却没有烧过的痕迹，只有一位僧人被手下士兵所包围，一位士兵举刀正要砍向他。那一刹那，将军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我明明看到寺庙和塔被烧了。结果跑来看一下，寺庙和塔根本没有被烧的痕迹，只有一位和尚被捆到塔前，即将被斩首。哦，这个和尚肯定不是凡夫俗子。”

一想到这儿，将军立即制止了士兵的举动，下马后，亲自为高僧解开了绳子。

“您看将士们有眼无珠，冒犯了高僧大德，还请慈悲为怀，原谅我吧。”当听说眼前之人即是圆光，更是表示早就仰慕其才学与声望，再次低头表示谢罪……

圆光法师还是日后推出新罗花郎道中心理念“世俗五戒”之人。就像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一样，我喜欢描写朝鲜族人及其相关人士的足迹，因为我有时也是朝鲜族的一份子。我之所以抓住人类心灵探究不止，就是因为我也是置身生活的洪流之中、整天哭哭啼啼的凡人之一。我之所以笔耕不辍的原因也在于，我无法停止这探索……

我有时候会想，这就如同潜入山洞中面壁打坐的高僧大德……如果说二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选择的“山洞”是“小说”。

通过写小说，我遇见了无数个“我”，而任何一个“我”都“似我非我”，不是真正的“我”，却让我狂猛。

我通过写小说，发现了内心深处的自我，而同时，又明白那个“我”也不过是虚无的梦一般的存在。

那同时也是将“我”与“我们”进行联系，将“我们”纳入“我”中的过程。我明白“似我非我”的“我”是“我们”中的“我”，但同时也只能是“我”自身。这是一个加深对彼此认识的过程。

这个“山洞”不是被他人困住的山洞，而是自我选择的山洞，而发生在“山洞”里的所有事情，也都得由自己承担。尽管是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我时不时仍然害怕写小说。因为在某一瞬间，我已经摆脱自我，试图写出更广阔的世界。我在其中放开了“我”，却寻找不到“我们”。但我会始终进行探索。我写小说，也源于此。

近来，我开始在文学期刊《道拉吉》上连载长篇小说《我害怕我》。如同这一小说的标题一样，我不仅害怕我，我还害怕写小说。但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那种害怕在培养我。真正面临黑暗时，我看到无数的光在其中。“面壁”的体验告诉我，黑暗与光明不是截然不同的二者。

在这一瞬间，我仍然死死盯着空白的电脑屏幕，只有光标在不断闪耀，在屏幕上滑来滑去。这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屏幕，我可以在上面写下我在世上所体验、听闻的一切。我喜欢这种写作带来的紧张感，它让我知道自己依然活着……为了这些瞬间，我愿意毕生潜入小说这一“山洞”，面壁修行，乐此不疲。（新煜/译）

面壁修行

□朴草兰(朝鲜族)

只是讲故事而已

□金英海(朝鲜族)

该具有民族使命感，反映社会问题。而我的小说往往限于“小我”，反映不了社会和民族问题。后来，我有意识地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上，赋予一些民族因素和社会因素。我认为，反映怀揣炫丽“出国梦”的出国人员和留守家乡的人们的生活是我们朝鲜族离散文学的一部分。但是，我创作的作品中始终缺少些什么。而且有的时候因为被催稿，越写越感到无从下笔。因此，我一度苦恼不已，写作停滞不前。

苦恼中，我又拾起了书。我开始读韩文的书、中文的书，有关小说、随笔创作的书，有关人生修养的书，甚至包括法律方面的书籍。后来，我终于开悟，文学是人类学，人是社会人，具有社会性。我通过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而人物栩栩如生，就具有了社会性、真实性。当我意识

到了这一点，我的创作也就有了支撑点。我决定把讲故事坚持下去。发生在我身边的和我听过的平凡故事、边缘人的艰难生活、活得开心和不开心的人们林林总总的经历，都可以纳入笔下。我书写身边亲朋好友身上发生的故事，那些很多人都会经历的故事，我的小说开始变得有血有肉。在《风》和《排泄障碍》中，我描写了面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30年轻妇女的彷徨以及对欲望的渴求；在《签字》中，我讲述了老年人凭借一纸契约，就结成半路夫妻的故事；在《呼吸》中，则叙述了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职场生活。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就在于这些故事是我们生活中所常见的。

归根结底，坚毅生活着的个体的故事、家庭的故事、社会的故事都是我文学创作

或父亲？留守者抑或漂泊者？……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正如阴阳调和，我们身体里既有雌性荷尔蒙也有雄性荷尔蒙一样，对于人们来说，现实与理想总是同时存在。

这就如同花的叶子只有吸收养分，花才会盛开一样，叶子只为开花存在。如果在具体琐碎的现实中，没有理想支撑着我们，我们的，人生不过只是虚无缥缈、痛苦万分的劳动而已。

在战争的残酷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虽然“游子”的理想不会给每个家庭都带来幸福，但心里始终怀着如同“游子”般的丈夫，母亲顽强地生活了下来。而这时，父亲就成为一个家庭的理想，他只能“如同月在云中飘，孤独的一条路”（出自朴木月的诗作《游子》）。

也许正因为如此，每当听到“旅行者”或者“人生的过客”诸如此类的字眼，我就会感到一种血缘般的亲切。当世上的母亲在染红的夕阳下挥汗如雨、辛苦劳作，我也如同“游子”，在这样码字。

这也许就是我写作的理由。（新煜/译）

“云中月”

□金锦姬(朝鲜族)

我母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与东北地区的变迁一起，她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母亲的老家是被称为“大石头”的小山村，隶属于“延边”。在那儿，已婚妇女都习惯称自己的丈夫为“游子”。

我曾经到延吉求学，每当坐火车路过“大石头”这一小站时，我都会想象一座像小山包似的、未经雕琢的，因自然风化形成的、没有棱角的岩石块。由于那里盛产土豆，不盛产大米，大家爱着花样做土豆——煮土豆、煮土豆、烤土豆、土豆丝、炒土豆、土豆汤，甚至还用冻土豆做土豆饼。作为“长白山下第一村”，那座小山村的人们，总是特别能够吃苦耐劳。

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游子”，以前经常是一走就十几天不回家。后来我出生了，父亲在家的时间没有增多，反而更加寥寥无几。后来，我考察过父亲曾经从事的多种职业，也沿着父亲曾经

的足迹到过多地，却始终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在吸引他，让他不着家？

我不认为这样的故事是只属于我们家的秘史。随着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作家直接或间接交往的日益密切，我对朝鲜民族的“父亲”和“母亲”有了更多的思考。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的母亲在严酷的命运面前，依然固守农家，坚强的地生存，赡养年老的父母，抚养年幼的子女？尽管她们也会有不耐烦，但为什么每次面对偶尔探家的不负责任的丈夫，仍然可以微微一笑？

同样的问题，我也想去给别妻弃子、不断漂泊的父亲们：你们为什么停不下来，四处漂泊，究竟要找寻什么？

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还是愿意用现实与理想这一老套的话来形容他们。回顾我们的人生和文学，不也是如此吗？母亲抑

“爱上你，我不后悔”

□朴松天(朝鲜族)

老一辈的作家们都很担忧朝鲜族文学的未来。因此文学界的每一位前辈作家们都加倍关心我的成长，我也感到了写诗歌已经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爱好，我将要肩负着我们民族文学的未来。这种使命感使我更加勤奋地学习与创作。

大学的生活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段故事都会成为我创作的材料。于是一首又一首诗歌在我的笔下创作出来。大学时期，我曾经获得过一些小小的奖项，如“李陆史文学奖”、“儿童文学新人奖”等。这些获奖作品大都是来源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个人认为，创作就是把生活分解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分子，再用艺术手段把它组成不同模样的艺术品。诗歌创作也不例外，把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东西，添加自己的情感，用最美的语言加以修饰，出来就是一首诗歌。

今年6月，大学毕业后的我在一所外语学校就业，从事教学工作，主讲韩语写作与口

语。这又是一个新的创作环境，给学生们讲课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教学经验不足的缘故，每天的工作都让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在如此忙碌的生活中，我也几乎没有一天远离过诗歌，我的办公桌上也放着一本诗集或者有关诗歌创作的理论书籍。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离不开诗歌。它陪伴了我大学四年最美好的时光。每当我再一次读大学时写的作品时，满满的回忆在脑海里舞动，舞动着难忘的青春旋律，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耀眼。

迷恋上诗歌的日子，眼前的每一片画面都是诗意浓浓的风景。我愿把我人生中每一段美丽的故事用诗语记录下来。岁月流逝，等我已不再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时，每一首诗都会成为淡淡的回忆，让我想起一段段难忘的故事。

我愿用诗歌画出我的自画像，尽量画出英俊潇洒的青春魅力。当我的自画像真正魅力四射的时候，我会幸福地微微一笑。

我会轻轻地对诗歌说：“爱上你，我不后悔。”